

【一般论文】

朱自清与陈寅恪的交往与文学思考 ——以《朱自清日记》为中心

The Interaction and Literary Thought of Zhu Ziqing and Tschen Yin Koh
A Study Based on “Zhu Ziqing’s Diary”

陈洁仪、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Chan Jye Yi, Teoh Hooi See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Email: ilovejaychou0914@live.com.my, teohhooisee@um.edu.my

Published online: 31 DEC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Chan, J. Y., & See, T. H.. (2022). 朱自清与陈寅恪的交往与文学思考——以《朱自清日记》为中心: The Interaction and Literary Thought of Zhu Ziqing and Tschen Yin Koh A Study Based on “Zhu Ziqing's Diary”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3(2), 55–70.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2.4.202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2.4.2022>

摘要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除记录其日常生活，也记录他与其他文人学者的互动。当中与陈寅恪的往来记录有五十五处，然而关于他们的交往研究获得较少的关注和讨论。朱自清和陈寅恪，身份背景和知识体系不同的两人在看待唐代小说文体的问题上站在同一观点，均以“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文学观点来思考唐代文体发展的共时性，这令人不禁好奇二者的交往是否对彼此的文学思考产生任何影响。故本文欲通过《朱自清日记》，以朱自清日记中陈寅恪第一次出现记录

*陈洁仪，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人交往圈、中国近现代文学；张惠思，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戏曲、中国近现代文学、马华文学。

（1932年）至最后一次出现记录（1948年）为时间范围，梳理二人的交往史实之余，去探究朱陈两人的文学思考。同时也希望由此探索并开拓二人之间更多学术对话的可能性，相信对学术史而言也具意义性。

关键词：《朱自清日记》、文学思考、唐代文体、朱自清、陈寅恪

Abstract

Aside from documenting his daily life, Zhu Ziqing's diary also recorded his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literati and scholars. The diary recorded 55 interactions with Tschen Yin Koh, however studies on their interactions have been scarce. Despite coming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knowledge systems, Zhu Ziqing and Tschen Yin Koh shared the same literary viewpoint of "an era for an era," which pertained to the synchronicity of literary style's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raises the concerns of whether their interactions affected their thoughts on Tang Dynasty's literary style. Hence, this paper took Tschen's first appearance (1932) until his last appearance (1948) in Zhu's diary as the temporal scope and investigated their literary thought and exchange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academic dialogues between Tschen and Zhu,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significance to academic history.

Keywords: Zhu Ziqing's Diary, Literary Thought, Literary Style of Tang Dynasty, Zhu Ziqing, Tschen Yin Koh

一、前言

文人与学者日记的出版揭开了日记的隐秘性，使个人记忆转为社会共同记忆，得以作者本身的角度与立场去展现当时的历史场景，甚至将自身呈现出有别于公众记忆的形象，值得我们去探究。如朱自清即便已是当时知名的散文家，亦为新文学运动旗杆之一，然而在日记中却一再透露出对于任职清华中文系主任的繁重工作以及自身学术文章含金量多寡的巨大压力。有别于其散文作品里常话家常或寄情寓景，朱自清在日记中曾多次吐露出自身的自卑、苦恼与郁闷，“今日心情殊沉郁（Gloomy），一念前途，慄慄危惧。”¹、“近来时感命途多舛，今天更感无家无友之寂寞，孑然一身，自卑感油然而生”²、“谈到关于闻的态度时，我述说我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这确实有些失态”³等，这些都是朱自清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职业与学术成绩时的自我披露，也是其散文作品中较难一见的苦闷情绪。

此外，日记除了是一种个体的记忆载体，实则也形构日后集体的记忆载体。德国史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个体记忆除了容纳“来自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和个人的记忆，同时也是展现“个体与各种集体记忆之间独一无二的关联方式”的场所。⁴由此可见日记承载的不仅是作者本身的记忆、一个“此时此地”的生活记录，也记录着作者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在朱自清日记中，除了日常生活的描写之外，也记录着他与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如闻一多、俞平伯、浦江清、郑振铎、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朱自清与他们的往来关系当中或因同样的新文学运动背景，或因同个社团而相识相熟，又或因在同一职场共事关系而有所往来。当中日记也有记录朱自清与陈寅恪的往来，根据朱自清日记里有关陈寅恪的记录便有 55 条。然而关于他们交往的研究却较少获得关注和讨论，其中最近的讨论便是 2020 年孙羽津的《陈寅恪、朱自清学术互动论略——以 1936 年退稿事件为中心》⁵。孙羽津的这篇文章以 1936 年朱自清退陈寅恪《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稿的学术公案为主，进而去探究朱自清与陈寅恪的学术理念

¹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页 245。

²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546。

³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页 25。

⁴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 38。

⁵ 孙羽津，《陈寅恪、朱自清学术互动论略——以 1936 年退稿事件为中心》，《文艺研究》第 1 期（2020 年），页 61-68。

与思想，然而却未更深入去梳理朱陈二人之间的来往，以及二人的交往对彼此学术理念是否有任何影响。本文则欲通过《朱自清日记》，以朱自清的日记中陈寅恪第一次出现的记录（1932年）至最后一次出现的记录（1948年）为主时间范围，于第一部分中梳理朱自清与陈寅恪的交往，进而在第二部分去探索朱自清与陈寅恪的文学思想，看在文学思想路径上原本与陈寅恪不同道的朱自清最后何以会在唐代文体的论述中与陈寅恪站在同一阵线上。

二、 日记中的朱陈交往——文学思考的分歧

根据朱自清日记里 55 条关于陈寅恪的记录，这些记录内容包括书信往来、私人探访、学术讨论、公事、出游、阅读陈寅恪文章的笔记，以及从他人或他处取得关于陈寅恪的内容。在朱自清的日记里，第一条关于陈寅恪的记录是 1932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上午接陈寅恪先生来信，于课程有所签注。”⁶当时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寅恪则是中文系、历史系的教授，而这封信所属公函，因是关于课程安排或调整需系主任朱自清的批准，因此才会有了日记上的第一次往来。除了公函的往来，实际上朱自清与陈寅恪的书信往来多集中于 1947 年和 1948 年。然而日记中只简单记录他写信给陈寅恪，加之当时朱自清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同时也忙着将其许多文章整理、编辑成书，因此日记中并无过多阐述他和陈寅恪之间书信往来的内容，只能看到朱自清做了简单的写信记录。⁷尽管朱自清日记中有些部分只是较为简单的记录，在针对一些人事物时朱自清反而有更直接的叙述，也更显真实性。有关陈寅恪的性情、个性评价，日记外的他人对陈寅恪的评价是“性情孤僻、很少社交”⁸、“学问渊博，识力精到”⁹，这些评价予大众对陈寅恪的印象便是德高望重、沉默寡言的学者，但朱自清却记叙了与世人既定印象中不一样的陈寅恪。1933 年 3 月 4 日，叶公超宴客，邀请的客人当中便有陈寅恪和朱自清。朱自清在日记中叙述了宴客上陈寅恪称赞钱穆所著的《先秦诸子系年稿》是“教本最佳”、“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

⁶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171，281。

⁷ 1947 至 1948 年间，陈寅恪和朱自清的书信往来记录如下：1947 年 10 月 22 日的“梦家 寅恪”、1948 年 1 月 17 日的“纯明 安平 慰堂 寅恪 今甫 孟实 平伯 士侯”、1948 年 3 月 10 日的“圣陶 开明 伯鹰 楚均 寅恪”、1948 年 3 月 16 日的“斐云 知辛 梦家 寅恪 从文”，以及日记中最后提及陈寅恪的记录，即 1948 年 7 月 20 日的“寅恪《独立时论》社”。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卷》，页 467，489，497，498，516，367。

⁸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 18。

⁹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卷》，（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页 20。

而新见亦多”¹⁰，日记中朱自清对陈寅恪的评价：“寅恪谈吐极佳，余第一次见其意兴好也”¹¹。这里侧写描述的不仅是陈寅恪平日寡言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了在此之前朱自清与陈寅恪的往来或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因此在叶公超的这场宴会上才得以让朱自清第一次见陈寅恪这般好的状态。

叶公超的宴会之后，朱自清于同年 3 月 21 日再次拜访了陈寅恪。此次的陈寅恪依旧有所畅论，只是这次畅论的课题是针对清华中文系开会之事：

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教授相反，其逻辑推论 (Logical Consequences) 有二：1.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颇疑二叶及闻有野心，来耍手段 (Play Politics)，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韩谓清华外国语文系自公超来后颇多事，其说乃闻诸温特 (Winter)，温特似与公超善，不知何有此言。¹²

日记中的“前日开会事”指的应是 3 月 17 日的清华中国文学研究部研究生萧涤非的毕业考试，担任那场的考试委员除了陈寅恪之外，还有闻一多、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吴宓、叶石荪和叶公超，上文的“二叶及闻”即叶石荪、叶公超和闻一多。据朱自清当日的记录，萧涤非的考试成绩仅中等，原因为“知识大抵转贩而来”、“答案多模棱闪避之辞，记诵亦太劣”和“无想象力，不能持论”¹³。对此，闻一多对“此间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¹⁴，陈寅恪则把闻一多的不满推论为“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和“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无形中也透露出清华中文系的行政体系与教授们的治学方式有所差别。陈寅恪在这段评论了之后却怀疑叶石荪、叶公超和闻一多“有野心”，前后话的矛盾不禁令朱自清困惑，认为陈寅恪是“前日开会时间太长，神经又颇受刺激，故颇失常态”¹⁵，与平日的端庄学者形象不一样，显出了陈寅恪亦有失神忘形的时候。

1933 年 9 月 8 日的下午，朱自清去探访陈寅恪，陈寅恪告诉他桥川时雄的《陶集版本源流考》中有《郑叔问札记》的相关内容¹⁶。当时的朱自清专注陶诗

¹⁰ 朱自清 (著)，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02。

¹¹ 同上。

¹² 朱自清 (著)，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08。

¹³ 朱自清 (著)，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07。

¹⁴ 同上。

¹⁵ 朱自清 (著)，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08。

¹⁶ 朱自清 (著)，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46。

的研究，在其日记中可见早在 1933 年 4 月 20 日时便与陈寅恪的学生，亦是朱自清的好朋友浦江清谈论陶诗。当时浦江清认为陶渊明之前的诗体皆为乐府体，陶渊明以其个人生活为诗的主题，朱自清对此表示“其说甚可注意”¹⁷。在陈寅恪告知他桥川时雄所著的《陶集版本源流考》之后，11 日时朱自清便阅读了《陶集版本源流考》，也觉“甚有用”¹⁸。

陈寅恪对陶诗十分倾佩，也做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有别于当时学者把研究焦点着重于陶渊明的文学作品，陈寅恪则倾向于陶渊明的思想研究。1933 年陈寅恪发表了一篇名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的文章，此文谈论从东汉顺帝到北魏太武刘宋文帝这段期间，天师道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的关系与滨海地域有所关系。1935 年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以分析桃花源的地理位置和桃花源的史实来考证《桃花源记》中的“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的说法；1942 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谈论陶渊明的思想。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才算是完成研究陶渊明的思想体系和继承。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陈寅恪指出在佛教大行其道的东晋时代中，天师道对佛教的态度有排斥、皈依和调停，对周孔世法则是没有任何冲突之处。家族世代都信奉天师道的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是排斥，并创建“新自然说”，追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因此陈寅恪定论陶渊明的为人是外儒内道，远释迦而易老庄、宗天师道。

有意思的是，朱自清早在 1935 年发表的《陶诗的深度——古直的《陶靖节诗笺定本》》中便稍微讨论了陶渊明的思想。文中他以陶诗里的“道丧向千载”来叩问“道丧”于陶渊明的意义，并以《饮酒第二十首》为例，表示诗中的“真”与“淳”不见于《论语》，却见于《庄子·渔夫》的“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和《老子》第五十八章中的“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陶诗如《劝农》和《感士不遇赋》中皆能看到“抱朴”一词，而“抱朴”是道家老子的观念，属“淳”的一面。朱自清认为陶渊明把“复真”、“还淳”的重担赋予儒家上，是把孔子学说道家化，因此他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属于道家的。他的这番见解与陈寅恪 1942 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对陶渊明思想的观点是同为一路的，虽然两者的文章发表差距 7 年，但二人谈论陶渊明却是更早的时候，即 1933 年。陈寅恪在当时除了提供文献资料给朱自清，也曾向朱自清谈起《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的概要。而后朱自清于 1933 年 11 月 29 日阅读《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之后，便在日记里写道：

¹⁷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12。

¹⁸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46。

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 天师道与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 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 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 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 羲之爱鹅，或取其能解丹毒。¹⁹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写下的第一条笔记要点“天师道与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除了谢王之外，陈寅恪在文中亦提及信奉天师道的还有丹阳陶氏。虽朱自清并没在日记中多加撰述他与陈寅恪对于陶渊明研究的相关讨论，但是可推断二人文章之间的呼应或是 1933 年期间的往来讨论而得出的结果。

依据朱自清日记与陈寅恪来往的 55 条记录中，可发现往来内容中与学术讨论相关的记录便有 10 条，并多聚集在 1933 和 1934 年。那段期间的朱自清讲授“诗”、“歌谣”和“新文学研究”三门课程，作为教授和学者的朱自清或感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因此那个时候的朱自清与陈寅恪常有学问交流。陈寅恪的态度也十分开放，像他会主动告诉朱自清同人之中谈论乐府的精者²⁰，也会跟朱自清谈论中国乐谱²¹，其中便涉及了唐代平仄声与当时平仄声的区别。对于唐代平仄的研究，陈寅恪亦是有所关注的。在朱自清 1933 年 10 月 18 日的日记中，清华中文系教授们便在一起“讨论研究生毕业考试科目等问题”，而陈寅恪在会议中谈起古代语言问题：

陈寅恪谈四声，疑古三声相混，受梵吹影响始分为三，因韦陀中梵唱亦分三调也。又谓《高僧传》谓齐竟陵王子良集诸文士作《梵吹新声》，《南齐书》中亦有之，而为人所删去。亦见《南史·陆厥传》后。又谓诗音平入通押，或因详略之故。如 n、ng 省去即可与入声相押也。又今日之平声，昔日恐亦有语尾。（如丝，silk，弥勒 Melk（？））故此事殊难定耳。²²

陈寅恪在会议上谈论古代四声问题，很明显是在撰写《四声三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心得，并在会议上分享出来。陈寅恪在会议中提起的四声问题与《四声三问》中的论点并无多大差别，都认为四声中的平、上、去声是“中国文士依据及

¹⁹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65。

²⁰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12。

²¹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16。

²²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 257。

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归纳而成，然而《四声三问》更多的是探讨四声的源来与发展，诗音平入通押和平声有语尾一事却未见文章中。

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在创作散文或诗歌时注重文字的旋律，因此对音韵的研究也有所关注，甚至在日记中表示“以后须能教诗声律史”²³，可见其对这块研究的重视。在阅读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后，朱自清在日记中写下其阅读笔记：

读寅恪先生《四声三问》，陈义凡三：1. 中土平、上、去三声之分，系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入声不易混，自为一类）。2. 四声之说起于周颙、沈约，以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居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实情理之当然，而由《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之生卒考之，建康经吹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世而极于齐之初年。是时竟陵王子良在鸡笼西邸，同时集诸文士作《四部要略》，又集诸名僧造《经吹新声》，此又二者相关之机缘也。至曹植《鱼山集》，自系伪作。其事出刘敬叔之《异苑》，及刘义庆《演验记》。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会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3. 论四声者皆说五声而不及四声，盖四声之用于属文，谈音理则当言五也。²⁴

从以上的笔记来看，朱自清更加着重于唐代四声的演变，而似乎故意不提或忽略陈寅恪《四声三问》中“证外来文化之输入必有助于本国之文化”之用意。这或许是因为朱自清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染和影响，因此对陈寅恪文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后的文化关怀想是不能体会、理解。朱自清对陈寅恪更多的是敬重，对待如陈寅恪一般“学者气重之学者”的态度可早见于其1931年10月8日的日记：“此等学者，当敬而远之，他日可读其书，不必交其人。”²⁵ 因此即使三十年代的日记里看到朱自清与陈寅恪常有学术往来，但那也仅限于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君子之交。

尽管如此，朱自清却无法真正做到“远之”。其中主要的原因源自于其对自身的学术能力的自卑，这在其日记里处处可见。这也是为什么在1933年12月9

²³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167。

²⁴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269。

²⁵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54。

日，孙楷第去找朱自清时谈及陈寅恪的文章，朱自清因未见陈寅恪之文而感到“甚惭”²⁶。朱自清的“甚惭”或惭于他人阅读了陈寅恪的最新文章，而本身还未见着，无法与其他学者做针对文章做深度交流；也或惭于自己对学术的敏感度不高，否则也不会因为未及时见到陈寅恪的最新文章而感到惭愧。然而因为清楚自身能力，朱自清便有意识地往比他更有能力的学者靠近、学习，比如陈寅恪。前期与陈寅恪的交往，虽常拜访陈寅恪，一起做学术讨论，然而朱自清对陈寅恪更多的是敬重，不算深交。西南联大时期之后朱自清与陈寅恪依旧有着联系，叙述不多，但关系似是更甚从前。像是日记中记载陈寅恪去了香港大学教书后，托罗莘田转达了其对朱自清的叮嘱。²⁷虽然叮嘱内容不详，然而朱自清使用了“叮嘱”二字，相信也意味着陈寅恪对他有所上心，遂好意提醒。由此可见，朱自清与陈寅恪的来往已有所升华，并非只有敬重之情而已，尤其处在多变的历史中，更多的或是因相知而相惜之情，而这份情感对朱自清的文学思考也产生了影响。

三、 朱陈的文学共识——雅俗文体的共时性

1935年10月25日，朱自清的日记中记述着朱自清作为《清华学报》的主编分别向陈寅恪、俞平伯和王维诚发出投稿邀请，“陈、俞许之，而王则以无暇写文章而写绝之”²⁸。然而到了1936年10月22日，陈寅恪打电话询问朱自清是否接受陈寅恪在《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在日记中，朱自清表达出了他的烦恼：“固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²⁹朱自清的决定让他烦恼的其中原因在于其向陈寅恪邀稿在先，退稿的决定似乎让他觉得是对陈寅恪的不尊重。即使审稿之后的隔天又重读一遍，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仍未刊登在《清华学报》中，朱自清退稿决定背后的更大原因恐怕得归于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

陈寅恪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认为“盖以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³⁰，小说文体始于韩愈的古文试做，此文一出便在学术界引起许多质疑。像是钱

²⁶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265。

²⁷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206。

²⁸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387。

²⁹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442。

³⁰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440-444。

穆于《中国文学史》中便认为陈寅恪的这些观点“不一定对”³¹；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只认为“传奇文的运动，我们自当视为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³²，依据传奇体与古体的类同和传奇体作者参与古文运动来证明唐传奇与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而后的王运熙在其《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中从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韩愈创作时间和古文与传奇文的文体之别来力证陈寅恪观点之错误。³³而根据朱自清在《中国散文发展》中针对唐传奇来源的叙述中看出他也不同意陈寅恪的观点：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神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³⁴

文中所谈论的唐传奇来源是依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亦近于俳谐”的文体脉络，认为作为小说体的唐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将神怪人情化”亦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一种证明，而朱自清在文中表示唐传奇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与陈寅恪的“以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是不一样的观点。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甫一出版除了使得小说正式登上学术讨论的舞台，其有关唐传奇的问题渊源与发展的论述也影响深远。朱自清的新文化背景和立场也使得朱自清自我的思想、知识体系更朝鲁迅的文学思考贴近，再加上朱自清多与郑振铎、闻一多、周作人、徐志摩等新文化运动代表文人多有往来，其本身的身份与立场不得不与陈寅恪对立了起来。1936年10月24日，即退稿事件的几天后，朱自清与闻一多一起参加鲁迅的追悼会。当中，闻一多将鲁迅比为韩愈，朱自清则在日记中写道：“韩氏当时经解被歪曲，故文体改革实属必要。”³⁵将鲁迅比喻为韩愈是可以理解的，因二者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中

³¹ 钱穆（著），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页220。

³² 郑振铎，〈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页316。

³³ 王运熙，〈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45-256。

³⁴ 朱自清，〈中国散文发展〉，《朱自清第八卷》，（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3391。

³⁵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442。

坚人物，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二人的文体改革对后来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可说是引领了文学风潮。然而，韩愈是以复古为变古，提倡古文写作，以文载道；鲁迅则是强调以白话文来创作新文学，反对作古，强烈攻击所有传统、过时的文化与艺术。以此来看，以鲁迅比作韩愈是基于二者引领文体潮流之故，若“以变古为复古”强加在鲁迅身上便会形成思想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朱自清“不易决断”的退稿决定除了其自身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和思想体系之外，更是来自于时代的主流观点和鲁迅带来的思想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在拒稿之后再次阅读陈寅恪的文章，并在日记里写下：“文中提出人道之因素部分来自韩。”³⁶朱自清早期的文学创作以“人的文学”为主，作品里充分体现出现代人道主义的精神，后转而专注学术研究时朱自清亦仍旧以人为主，探讨文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朱自清对陈寅恪文章的认同也基于“人道”，这在他1948年的《论雅俗共赏》中可看出：

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卑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³⁷

在以上的引文中，朱自清正面引了陈寅恪的话，直指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之后再接下“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两句话之间朱自清并未将唐传奇与古文运动之间的联系明确分隔开来，与《中国散文发展》中的笔调相比，《论雅俗共赏》中对“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之观点的态度明显较为缓和。但这里的缓和并不表示朱自清完全认同陈寅恪的观点，而是为了铺陈朱自清接下来的观点，即唐传奇的口语化影响了韩愈的古文创作，也因此奠定了安史之乱后的文体趋势——“雅俗共赏的趋势”，同时这也呼应了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唐代小说文体“既

³⁶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页442。

³⁷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论雅俗共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页1-10。

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³⁸之说，朱自清以此与陈寅恪达成了打破文体雅俗之界限的文学共识。

而针对安史之乱之后文体雅俗共赏的趋势，陈寅恪已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中提了出来。他引国史补卷的“元和以后，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元和之风尚怪也”和裴度的“以文为戏”来表示代表正统的“传统雅正之文体”并非当时流行的文体，当时社会中流行的文体是唐代小说，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则把二者相结合，故才有“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之结论。³⁹然而陈寅恪并没深入讨论此观点，而是到了后来的《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探讨古文与唐代小说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而推出“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⁴⁰的结论。陈寅恪此番结论在于骈文的腐化和散文的公式化已无法叙述、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而小说的驳杂无实、俳谐和雅俗共赏的特性，以及古文“便于创造”的优点除了造就唐代贞元元和的新文体，也得以成功宣传古文。除此之外，陈寅恪将小说“文备众体”的特征推及至诗歌，认为陈子昂、李白之辈以复古诗体给唐诗注入新血，但到了贞元元和之时元稹、白居易“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元白创造的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斯本为自然之发展”。⁴¹陈寅恪把唐代文体的溯源与发展归为文人以雅文创作通俗文学导致而成的结果，从单线性的文体发展改为共时性来探究文体的驳杂如何将雅俗兼具于一文之中。

朱自清曾于1921年10月10日发表了《民众文学谈》一文，认为民众文学分为两种，即以民众的生活理想为中心的通俗化的文学与文学者所写的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旨在提高改善民众知识和精神的文学，而朱自清认为后者较为容易实现。此时的朱自清虽然对民众文学，抑或雅俗共赏文学的概念引自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人的西方文学理论来阐述中国民众文学，并未曾想以中国文学史的结构体系去追溯通其所谓的“民俗文学”的发展。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散文发展》，朱自清仍旧是站在新文学的阵营来思考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直到1948年，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中从唐代文体的角度考究“雅俗共赏”的趋势，而这也是陈寅恪在《韩愈与唐代小说》和《元白诗笺证稿》中试图论证出来的。陈寅恪把文体发展的线性改放在共时性来探究，从文人以雅言创作通俗文学建构新文体来表达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共时结构关系，关注“一时代的文体与文体之

³⁸ 陈寅恪，〈第一章 长恨歌〉，《元白诗笺证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4。

³⁹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443。

⁴⁰ 陈寅恪，〈第一章 长恨歌〉，《元白诗笺证稿》，页3。

⁴¹ 陈寅恪，〈第五章 新乐府〉，《元白诗笺证稿》，页125。

间以及文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⁴²，这与朱自清的“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⁴³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故由此可相信到了人生后期的朱自清已不似当年无法理解《四声三问》背后的“证外来文化之输入必有助于本国之文化”，而是能够理解到陈寅恪关注唐代文学雅俗共赏中的“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文体共时结构关系，于是选择公开与陈寅恪站在了同一条的学术阵线上。

四、 结语

通过朱自清日记，可发现他与陈寅恪的往来虽没有他和闻一多、浦江清等人来得频繁，甚至在 1937 年前的交往记录中似乎看不出朱自清与陈寅恪的来往对他是否造成任何思想上的转折或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于 1942 年 2 月 3 日的日记中写下自己把原订的《古典常谈》改为《经典常谈》，却没进一步说明更改的原因。然而从《经典常谈》的改名可看出朱自清的文学思考出现了转变，这表示他不再坚持以古今作为文学的划分，因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在于经典背的文化遗产，而为了延续这份文化遗产，则须以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为经典或古文作注解。从这里便可发现朱自清此时的文学思考与陈寅恪所认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⁴⁴已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不再坚守新旧的划分，而是更着重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此文化遗产亦是陈寅恪所重视的。因此从《古典常谈》到《经典常谈》不止是“古典”和“经典”二词之间的字眼更换，更是朱自清的文学思考上打破时间的划分，把具有时间性的文学转为无时限性的文学。

朱自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文人之一，在看待唐代小说文体的问题上从原先的主流思维到后来的文体共时结构关系，朱自清文学思考转变的箇中原因显然与陈寅恪有着很大的联系。基于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认知以及对学术的热情，朱自清不计立场与被归为“文化保守派”的陈寅恪有所往来，即使往来不频密或交往内容较为零碎，但也不可忽视文章中的陈寅恪对朱自清文学思考上的影响。朱自清日记中虽未完整、详细写下其与陈寅恪的交往内容，却是一段不可忽视的交往记录，促使我们去深究并开拓二人之间更多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对学术史而言也

⁴² 张丽华，〈从“传奇文”溯源看鲁迅、陈寅恪的小说观念〉，《岭南学报》第 2 期（2017），页 159-182。

⁴³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语文零拾》，（上海：名山书局印行，1948），页 22。

⁴⁴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 284-285。

是极具意义的。

【征引文献】

一、中文著作

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至第十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杨树达，《杨树达文集：积微翁回忆录 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钱穆（著），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

二、论文集文章

王运熙，〈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语文零拾》，上海：名山书局印行，1948。

_____，〈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朱自清第三卷》，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_____，〈中国散文发展〉，《朱自清第八卷》，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_____，〈论雅俗共赏〉，《论雅俗共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_____，〈序〉，《诗言志辨 经典常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陈寅恪，〈四声三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

_____，〈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

京：三联书店，2015。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15。

郑振铎，〈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三、期刊论文

孙羽津，〈陈寅恪、朱自清学术互动论略——以 1936 年退稿事件为中心〉，《文艺研究》第 1 期（2020）。

张丽华，〈从“传奇文”溯源看鲁迅、陈寅恪的小说观念〉，《岭南学报》第 2 期（2017）。